

让当代诗歌回归诗歌本源

□丘树宏

中国当代诗歌怎么样回到诗歌本源,包含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诗歌的主题和内容,也就是诗歌表现的对象问题;第二个是诗歌的表现形式,即诗歌的体裁。说到底,也就是当代诗歌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怎么样回到诗歌本源的问题。

2013年我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新诗何时走出乱象》。我个人觉得当前的诗歌界比较乱,差不多可以说是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中最乱之一。在中国,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也很多,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来说,诗歌的活动丰富多彩,在这种“兴盛”的背后,隐藏着甚至暴露出一派乱象。新诗百年了,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既符合中国汉语言、汉文字特点,又能够吸收西方诗歌优点的诗歌文本。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新诗,首先不是守住和弘扬自身的诗歌传统,包括其中的内容和形式。当然,随着时空和时代的变化,诗歌还必须学习借鉴中国之外的诗歌的优点。但就在当下,问题的主要方面,还是如何回归中华传统诗歌的本源问题。

当然,当代新诗怎么样回到诗歌本源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我们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来思考和分析。我们并不是说,诗歌要有一种完全不变的主题、不变的内容、不变的体裁和格式。现在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已经走向开放和多元。文学,包括诗歌,也肯定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肯定也是开放和多元的,主题、内容、格式都应该开放和多元。而且,这是文学和诗歌的生命所在,如果不是这样它就没有生命。

包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肯定有它独特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世界才有丰富多样的生命,诗歌同样是这样。但是,无论是生命,还是诗歌,总会有一个自己本源的问题。

诗歌的本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是指全世界、全人类的诗歌,狭义是指中国本身的诗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身的东西,这个就属于狭义。从广义上讲,诗歌有它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主题和内容,我觉

得应该是真善美的,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价值指向。主题核心是真善美的,诗歌才能给人以真正的意义。要不它就成了负作用,诗歌给予人们的必须是正能量。

格式方面,诗歌有和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的特色,因此在它的格式方面也应该有所规范。如果诗歌写成散文就不成诗歌了,写成小说、话剧等等,更不是诗歌了。诗歌就是诗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

中国的诗歌主题、内容和体裁形式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当然,现在的诗歌在主题、内容,在表现形式、手段方面已经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者叫进步,它更时尚、开放、多元。主题、内容、形式都是这样。同时,中国新诗只有百年时间,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完善中、发展中,不可能一下子就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讲当代中国诗歌应该同时具备两个元素。一个首先是中华传统,中国诗歌传统的优秀的独特元素应该保留,这才是中国的,否则就不是我们的。而另一方面,又不是封闭不变的,特别是在开放的时代,它要走向社会和市场、走向全人类,这样的话,它同时也应该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语言的诗歌优秀的东西,包括主题和形式。

正因为处于这种阶段,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乱象状态似乎也不奇怪。我们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等等各方面都相对比较乱,旧的打破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诗歌也同样处于这种状态。其实说到底,诗歌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还是在社会。但我们不能简单将原因和责任推给社会就算了。如果没有引导、检讨和前瞻的话,诗歌就没有出路。今天,我们确实要思考怎么样能够逐步找到一种既有中华传统诗歌的优秀元素,又吸收西方现代诗优秀元素,而成为中国现阶段以及后阶段一种崭新的诗歌文本。

全人类包括中国的文学有着共同的内容和主题,比如真善美。中华的文化传统也有独特的主题和内容,比如,中华传统的“和”文化,还有释儒道文化,这都是我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所有

文学题材里,包括诗歌里面特点都很浓厚,我们必须继承、弘扬。

又比如我们有海洋文化,欧洲也有海洋文化。我们的海洋文化特质体现的完全是和谐、和平,郑和七下西洋,就没有占领别人一寸土地。西方的海洋文化则总是与殖民文化、掠夺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些体现在文学里就不同。我们的诗歌本源,首先体现在内容主题上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一致,是健康的,读了以后对人有好处,而不是假的、丑的、恶的。真正的文学是属于社会的,如果你写出来放在自己口袋里、带进棺材去,那你怎样写、写什么都无所谓,但只要你要给第二个人,包括你的妻子、父母、小孩看,就有一个社会责任问题,你就要负责任。这一点,是文学包括诗歌最基本的道德问题。

诗歌本源问题,就格式、形式来说,我们古代以来就是诗的国度,是诗歌古国,我们诗歌的起源和发展早于很多国家。讲到诗歌,首先要讲到中国,诗经、唐诗、宋词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十分高,再往下是戏剧的影响力也很大,其实中国戏剧中的诗歌成分也非常浓厚。这些诗歌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继承。中国文学是方框字,对诗歌有特殊的好处,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汉语同样如此。为什么中国的诗歌出现最早,而且比其他文学体裁发展的更充分、更辉煌?汉字和汉语语言比较适合诗歌这种体裁是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格律诗的重要不足,是自由度不够。我们为什么有唐诗宋词那么整齐优秀的东西?正是因为汉文化、汉字结构所决定的,但它也带来了自由度的不够。到“五四”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追求,追求科学、民主,追求文学的解放,在诗歌方面也打破原来的传统,开始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自由诗。学习西方是对的,学自由诗优秀的东西也是对的,是对中国古诗不足的重要补充。自由诗最大的优点在于自由,但我们现在新诗的缺点是太自由了。从内容到格式到各方面,天马行空,无边无际,毫无标准,毫无约束。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由诗要写得好,要写得比古体诗还要美,在无限自由的情况下写得隽永,别人记得住、能流传的诗歌,有时候可能比

古诗、比格律诗还难。诗可以分为诗和歌,诗要有韵律,需要节奏,适当的短,不要太长,不要太散,不要太自由。而歌则要十分讲究押韵、对偶等。这些都是诗歌这种体裁的基本要求、基本元素,也就是我们中华传统诗歌的本原所在。西方的自由诗,其实也有这些类似要求的。但是,我们现在许多的诗人和诗歌,已经漠视抛弃了这些东西,只学习自由诗的“形”,而没有学习自由诗的“魂”,因而导致“非诗化”非常严重。

我们必须正视这种不好的趋向。必须呼吁我们的文学组织,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这方面要有一种引导。各类杂志、报刊和其他媒体,包括网络,要有一种责任,即对诗歌本源和本体问题,从主题内容和体裁格式上都要有大概的指导思想。同时,我们又要实行百花齐放,主张大胆探索。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建立主流引导,真善美的主题内容不能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变,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也不能变,而且要做到兼收并蓄。所谓本源,并不是一味保守,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在自身优秀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新的成果,来形成自身的东西,形成新的自我。

现在确实到了我们要对诗歌本源和本体问题有所作为的时候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前以经济工作为中心,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但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这一块没有跟上。一个强大的国家仅仅是物质强,那不是真正的强,文化才是最高的竞争力,文化上不来,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地位,自身的发展也难以继。我们在抓文化强国建设,开展了高规格的文化工作座谈会,这都是很好的信号和机会。我们现在要好好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哪里,怎么样传承发扬好,同时如何吸收外面的先进文化,融合形成崭新的文化。

诗歌客观上是有层面的,有所谓文人圈子的纯诗歌,这类诗歌,艺术上的要求会高一些。但同时,诗歌最重要的是要面对社会,这就有一个诗歌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问题,其中甚至还包括诗歌的口语化。然而,通俗化、口语化决不等于低俗化、口水化。

如何让当代诗歌回到诗歌本源?首先,我们

的诗歌机构、文学机构和管理机构应该有所作为,我们的报刊和各类媒体应该有所作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应该有所作为,我们的诗人应该有所作为,各方面都要有所担当,要负责任,要有使命感,要对社会有引导和教化的作用。因此,我们呼吁从中国作家协会开始到省作家协会,包括负责文化和文学管理的各级党政机构应该好好思考和正视当前中国文学的问题、诗歌的问题和走向,真正起到一种正确有效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作用并不是约束,不是绳索,是健康性、引导性的东西,各级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也应该有担当的责任感、使命感才行。然而,这种引导、责任和使命问题,非但发挥的很有限,在目前反而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在我们的文艺管理机构、诗歌事业管理者中,在我们的报刊等媒体包括网络的编辑记者中,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诗歌“乱象”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制造者。这是很要命的事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尽快予以解决。

教育部门也至关重要。现在中国足球从娃娃抓起,整个体育系统的体制改革从这里突破,就是因为足球到了今天,已经影响国家形象和国民信心,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荣誉,再这样下去就会影响民族自尊心。诗歌现状有些类似,如果诗歌乱象走到今天中国足球这种地步,到时候要恢复就很难了。因此我们也要从娃娃开始抓起,传统的诗歌教育、包括现代诗歌教育,应该从小学开始进入教材,要通过培育老师来引导学生。要在大小小学校设置诗歌课程,按照年龄特点设置诗歌鉴赏课、写作课。同时,文学家、诗人也要主动走进校园,为学校的文学教育和诗歌教育做义务服务。

同时,诗歌的本源是什么,建议在全国开展大讨论。中国诗歌的现状如何?中国诗歌的走向是什么?诗歌界要出来呼吁,要通过全媒体来呼吁,我们确实应该有所担当、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与以往不同。古代中华文化曾经非常辉煌,当时尤其在欧洲的影响非常厉害,我们要重新回到或者说走向这个盛世时代。清代以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影响力不大?最主要是国力走向薄弱,国家地位下降,国家地位下降带来文化影响力、影响力都下降。我们的文化很优秀,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文化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包括诗歌的影响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样继承我们的传统,以及吸收国外诗歌的先进文明,来改革自己、完善自己,从而回归中华传统诗歌本源,真正建立适合我们自己的中国当代诗歌文本。

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步入“黄金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无论儿童的生活,还是儿童文学创作,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的功能;深入生活与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作家的修养;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冲破了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框架。因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亟待创新。

儿童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从18世纪中叶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以来,文学理论家们就一直在探讨的首要问题。两个多世纪前,由于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无论是世界童大师安徒生的创作,还是法国文艺理论家保罗·亚哲尔的学术专著《书·儿童·成人》,都用艺术的或学术的语言表达“儿童是天使”的儿童观。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实现高度信息化以后,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又提出“童年的消逝”的主张。目前我国也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的儿童状况又如何?儿童是“天使”,还是“童年消逝”?这不仅是一个创作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这都需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做出符合中国国情、有说服力的回答。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儿童文学的本质即取决于我们对儿童与文学结合的认识,又与我们对儿童文学功能问题的认识一脉相承。长期以来,让儿童文学理论家们纠结的即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教育的,还是审美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说”。他既主张儿童文学应“以幼者为本位”,又将儿童文学的功能定位在“启蒙”上。鲁迅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他认为孩子的状况“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首在立人”。鲁迅在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的信》中又说,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责任应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也认为儿童文学问题是儿童问题,而儿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可见“五四”运动的领袖们都认为儿童文学不仅有愉悦儿童的功能,更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都是表现贫苦儿童的饥寒,召唤他们觉醒与反抗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继承了“五四”传统,依然强调儿童文学的育人功能,曾经产生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是新时期以来,不少儿童文学理论家提倡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的阶段。它反对把儿童文学当作狭隘的教育工具,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格。这种新的理论在初期对以往儿童文学重思想内涵而忽略作品的艺术表现的倾向起到矫正的作用,对于推动新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曾产生一批意趣盎然、思想内涵深刻的好作品。特别是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黄金期的到来,不能不与这种理论的正面效应有关。然而,毋庸讳言,也有一些作家对于“游戏精神”的理解存在偏颇,用儿童文学的快乐功能代替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产生了一批形式表现较好但内容苍白的作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别作家为了追求作品的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不惜用浅层次的搞笑的东西去迎合小读者,而把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刻思想内涵放逐了,这类作品很难发挥儿童文学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教育作用。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澄

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创新刻不容缓

□马力

清儿童文学的本质与功能问题,理论的澄明,有利于作家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创作方向。

三是近年来,我们又开始重视并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作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将文艺与“伟大的中国梦”相联系,既看重文艺的教育功能,也强调文艺的“审美功能”。他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既是对“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的回归,又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进一步发扬。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儿童文学的本质和创新儿童文学理论指明了方向。

深入生活,提高文学创作质量,是目前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就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中国是一个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要使儿童文学作品更好地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就必须了解当今中国少年儿童生存与灵魂的实际状况。作家不仅要了解城市的儿童,而且要了解乡村的儿童;不仅要了解汉族儿童,还要了解少数民族儿童。只有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过去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虽然也提深入儿童生活的问题,但是强调不够,还需要根据今天儿童生存的实际状况,加大认识与实践的力度,以期作家对于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以后能写出精品力作。

作家问题也是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中所有的,但是对于加强作家的修养问题强调不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修养、涵养、修养”,“讲品位,重艺德”的问题,直接针对当下一些作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只重作品的经济效益的问题,是减少作品的“铜臭味”的关键之举。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帮助作家认识加强修养的紧迫感,从而使作家问题的理论阐释更有时代性。

儿童文学创作的评判标准不仅是儿童文学批评的准星,而且对未来儿童文学创作的走向影响极大。由于前一段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倡导,一些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在评判作品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艺术性、轻思想性的偏向,评判标准就是一种导向。要实现儿童文学创作由“高原”向“高峰”的飞跃,端正评判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对此儿童文学理论家有责任展开科学研究,以期制定出恰当的评判标准和评价体系,规范和保证儿童文学创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在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很少提到。为了使儿童文学阅读推广工作更加卓有成效,有必要对于儿童文学阅读书目的遴选、阅读方法以及组织管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使这项工作的展开更有科学性和持久性。

无论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儿童文学的功能问题、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问题,亦或是儿童文学的精品创作、作家修养与儿童文学阅读等问题,既是儿童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又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遇到的新问题,囿于原来的理论框架来阐释这些问题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儿童文学理论的诞生。

重要的是一种眼光

□刘勇

阎浩岗最近问世的《现当代小说论稿》体现了他独特的思想品位与学术眼光。

该书的上编主要关注现当代小说经典作品的“重读”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读者的变化,以及历史的不断延伸,经典作品的解读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因此,所谓“重读”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生存发展的一种常态化现象。但这里的重读是以一个学者站在特定时代高度对小说经典进行的重新探讨,是以全新的审美视角对经典文本展开的深入解析,是力图以更加客观公正的眼光对经典作品文学地位的重新评价。作者特别注意对鲁迅、巴金等作家那些关注不够、争议不小的作品做出富有深度的解读,给出了独具见地并令人信服的解说。作者没有因为“十七年”文学受到政治影响大、某种程度上存在“图解政治”的现象而绕开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而是看到了即使在“十七年”文学中,还是存在《创业史》《红岩》《李自成》《艳阳天》这些富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之作,作者的析告告诉人们,任何文学作品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时代因素的影响,包括特殊时期强烈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会穿越时空的,它身上的那些令人感动的东西,那些给人启发的东西,那些留下真实时代历史记忆的东西,是不会因为当时的某种局限而消失的。这些东西终究会流传下来,会继续并长久地给人以感动和启发。

该书的中编集中探讨了现当代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即现当代小说的传承与变化问题。当代小说是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脉络继续发展的结果,但将现当代小说放在一起论述,并不是两段时期小说作品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同一种视角共同考察小说作品的整体发展。文学史虽然需要分段研究,但历史本身是不分段的,历史进程中每个因素之间必然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本书作者从《红楼梦》到《苦菜花》,再到《丰乳肥臀》,目光连通了古代、现代、当代的小说发展脉络。不论五四文学对于文学传统做出了怎样的变革和改造,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创造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家自身就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现代文学的作品必然带有古典文学的深刻印记;成名的当代作家大多成长在“十七年”文学繁荣期间,他们在今后创作中也必然有意无意地对“十七年”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参照。立体地看待文学的发展过程,充分意识到现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作者对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研究就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作者“互文”的不只是不同的小说文本,而且还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生活内涵,不同的社会特质。这种眼光不仅对同时期的小说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互文性”阐释这种方法也有了新的补充和积极的推进。

该书下编则回到了作家研究上来,主要是“知人论世”研究方法的再度实践。作者着力探讨了从中国现代作家“幽默”的特色、京派的浪漫、矛盾与沈从文的共同点,以及丁玲和“红色经典”等问题。最后的落脚点是文学史写作的问题,以探讨文学史写作中对“文学”与“历史”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为结束。这一部分内容看起来有些散漫,其实核心是很明确的,就是以人论文,以文证人。“幽默”是现代作家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现代文学史上还曾经有过针对幽默的讨论,现代作家的幽默也

分为不同种类:有老舍那般充满了亲切感的诙谐,有钱锺书那般因学识中西而充满书卷气的尖酸,还有林语堂带着“牛气”的调侃。甚至对幽默进行过批评的鲁迅,其作品的一个最大魅力恰恰也正是深沉老辣的幽默。作者选取了鲁迅、老舍、钱锺书、张天翼、赵树理这几位作家进行综合分析,所选作家从“知识精英”到“文摊”作家,作品基调也从“横眉冷对”到平淡随和,具有丰富的维度和开阔的广度。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幽默产生的原因,这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观、创作态度、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所选的五位作家虽然同样具有“幽默”特质,但作者敏锐地看到了五者幽默之间的区别。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教育背景造就了作家看待人生世界的不同眼光,这也是作家幽默之所以能够如此多样化的原因。幽默的鲁迅之所以一直与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以幽默著称的作家林语堂合不来,在文学观点不同的背后是看待问题的不同眼光,而这样不同眼光的形成原因还来自两者差异巨大的经历和家庭环境。林语堂没有从小康家庭坠入困顿,也就没有机会如同鲁迅一般经历人情冷暖,自然也就不会对人性之恶和革命等等问题的理解有鲁迅的深刻和尖锐。

此外,作者还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各位作家的幽默是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表现的,如鲁迅的幽默主要来自思想的深刻并以白描为主来实现,张天翼的幽默来自语言、行为、心理等的互相矛盾,老舍与钱锺书主要以叙述语言取胜。难得的是,作者发现了老舍作品叙述语言与相声等民间艺术手法之间的紧密联系。赵树理的幽默则往往体现在有趣的人物外号和大团圆的结局上。在论述京派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较难界定、创作风格多样的松散流派,作者没有对其“正面交锋”,而是转换角度,采取了逆向思维的方式,先论证了京派“不是什么”。作者以严密的推理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京派“不是现实主义的”、“不是古典主义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既然这些特点均不符合京派,那么京派的风格特色又是什么呢?作者从“主张回归自然”、“描绘理想境界”、“抒情色彩”,以及部分篇章对奇风异俗和民间文学的借鉴这几个方面论证了京派文学与浪漫主义风格的契合。然而,京派毕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流派,这个流派的浪漫主义是非常独特的。作者对于“京派式浪漫主义”也作了非常准确的分析。应该说,这是作者的一个重大发现,具有突破性的研究价值。该书还论述了茅盾与沈从文的共同点、丁玲的“革命”性格、“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评估、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估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观点。而对于文学史写作的论述尤其具有创见性。在文学史的写作中,作品的选择依据尺度不好把握,“文学史”三个字,首先是文学,而所书写的又是历史,文学性和历史价值两者均不能够偏废。而“文学性”这个概念比较抽象,作者从“真实感”、“艺术感染力”等方面论证文学性的评估标准,为文学作品的界定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维度。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本身是一个去粗存精的过程,文学史只能越来越薄,绝不可能越来越厚,在文学作品筛选入史的过程中,具有历史感的作品与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均有存在的价值,并且每一部文学史的写作都带有作者自身的观点和选择原则,进行文学研究,还需要借助大量的原始材料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这一点作者也给出了有益的提醒也